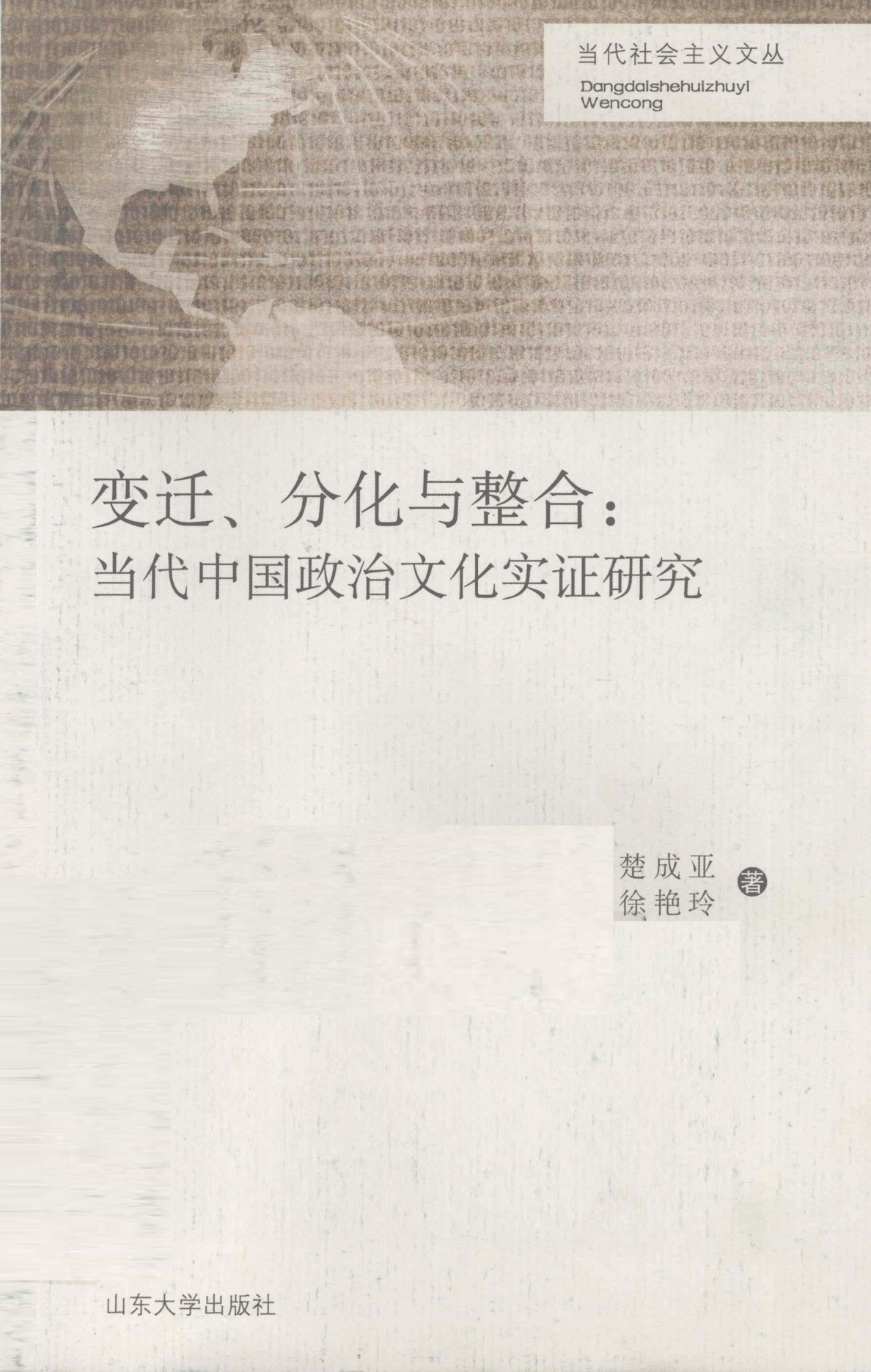




当代社会主义文丛

Dangdaishehuizhuyi
Wencong

变迁、分化与整合：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

楚成亚
徐艳玲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985 工程”资助项目

变迁、分化与整合：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

楚成亚 徐艳玲 著

山东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迁、分化与整合: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实证研究/楚成亚,
徐艳玲著. —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5607-4291-5

I. ①变…

II. ①楚… ②徐…

III. ①政治—文化—研究—中国—现代

IV. ①D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63973 号

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7 号 邮政编码:250100)

山东省新华书店经销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20×1000 毫米 1/16 17.5 印张 299 千字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00 元

版权所有,盗印必究

凡购本书,如有缺页、倒页、脱页,由本社营销部负责调换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	(1)
第二节 本研究分析维度及研究假设	(3)
第三节 资料及技术说明	(6)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媒介	(9)
第一节 大众传媒与学校的主体地位	(9)
第二节 不同政治社会化媒介重要性的群体差异	(13)
第三节 政治社会化媒介对政治情感的普遍影响	(26)
第四节 家庭和学校对于政治认知的特殊影响	(58)
第五节 政治社会化媒介在政治价值观方面的“失灵”	(78)
第六节 小 结	(91)
第二章 中国公民的政治认知取向	(95)
第一节 对政治重要性的认知差异	(95)
第二节 对政治话题的普遍疏离	(100)
第三节 对政府清廉程度的认知的分化	(105)
第四节 较高的生命财产安全感	(113)
第五节 较高的社会稳定感	(120)
第六节 社会公平感的分化	(127)
第七节 小 结	(134)

第三章 中国公民的政治情感取向	(137)
第一节 公民自豪感的提高及来源	(137)
第二节 对政治系统三个结构层次忠诚的差序	(146)
第三节 “好中央，坏地方”的信任结构	(150)
第四节 对不同类别政治组织的信任的差异	(158)
第五节 小 结	(168)
第四章 中国公民的政治价值取向	(170)
第一节 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延续与分化	(170)
第二节 权威主义人格的消退	(178)
第三节 渐进式改革共识的扩展	(188)
第五节 对自由与平等的选择	(199)
第六节 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的过渡	(208)
第七节 小 结	(218)
第五章 作为政治观基础的社会观	(221)
第一节 家族主义	(221)
第二节 人际信任	(226)
第三节 竞争意识	(231)
第四节 小 结	(237)
结 论	(239)
附录一 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文化观念调查问卷	(245)
附录二 1990~1993 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与 2009 年数据对比表	(255)
主要参考文献	(258)
后 记	(263)

导 论

当代中国政治生活中有两个引人注目的话题,即政治稳定的前景和政治民主的前景。人们通常是从利益分化的角度推断中国政治稳定的前景,但实际上政治权威合法性的直接来源并不是物质利益而是文化价值系统。经济发展与民主政治之间的相关性也得到了广泛论证,但直接影响民主政治发展的并不是经济本身,而是人们的价值观。因此,对政治文化系统进行分析,是直接把握中国政治走向的可靠途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研究的一项重大任务。

第一节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现状

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研究大多采用文献资料法,或从历史传承的角度分析传统政治文化在当代中国的积淀和转型,如张英魁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及其现代价值》(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9 年版)、杨阳的《文化秩序与政治秩序——儒教中国的政治文化解读》(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和吕元礼的《政治文化:转型与整合》(江西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或从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的内在逻辑关系的角度分析当代中国政治转型的动力机制,如李志勇的《市场经济视野中的中国政治文化转型研究》(河北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徐宗华的《现代化的政治文化维度》(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等;或从国家意识形态的角度分析主流政治文化的变革与建构,如姜键的《当代中国基本政治遵循与主导价值取向研究》(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任剑涛的《后革命时代的公共政治文化》(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或从政治系统环境的角度分析全球化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影响,如李春明的《全球化与当代中国政治文化发展》(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等等。这些研究理论性较强,给人们以深刻的启发,然而,由于缺乏实证资料

的支撑,难免授人以“主观臆想”的把柄。^①

事实上,政治文化理论原本得益于行为主义及实证方法,这种方法的突出特点是注重精确化以及结论的可验证性。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社会中逐渐形成寻求政治改革的思潮。在此背景下,出现了一些对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

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在全国22个省市进行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基于该调查数据所形成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闵琦的《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和张明澍的《中国政治人:中国公民政治素质调查报告》。该调查是在所谓的“政治文化的危机”、“政治认同的危机”和“整合危机”的背景下进行的^②,其分析框架和测量指标主要来自阿尔蒙德、维巴、裴鲁恂(派伊)等的政治文化理论,调查内容涉及政治认同、政权取向、政治信任、政治效能等,调查目的在于为政治体制改革寻求支持条件。该调查的主要发现包括:中国人的心灵深处已牢牢埋藏着一一种对国家的忠诚感;公民政治心理中要求政治改革的张力已经形成;改善党的领导的要求已经形成;但中国公民仍然缺乏民主和法制等宪政观念;等等。^③

武汉大学李艳丽博士以在湖北省进行的一项政治文化调查的数据为基础写了《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一书。该研究主要使用的是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部分分析框架,虽然书中大量引用了英格尔哈特的观点,但并没有使用其测量指标。该研究所关注的问题较为狭隘,主要是中国公民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认识、权利意识以及对政治改革的态度等问题。该研究的主要实证结论包括:大部分中国公民仍然奉行集体主义价值观;大部分中国公民尤其是文化程度较低的人仍然有较强的权威依附意识;不同职业群体对改革的态度差别较大,农民和干部群体持有更强的保守心理。^④

对不同群体的政治亚文化的专门研究主要有李培林等人的《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以及沈传亮的《公务员群体的政治文化研究》等。前者主要研

① 参见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② 参见闵琦《中国政治文化——民主政治难产的社会心理因素》,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236~237页。

③ 参见《中国政治手册》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载1987年10月26日《世界经济导报》第14版。

④ 参见李艳丽《政治亚文化:影响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特殊因素分析》,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57、174页。

究了城市社会中的各种矛盾冲突,其中与政治文化密切相关的重要发现有:阶层认同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社会分化的两极具有更强的社会冲突意识。^①后者则借助实证材料较详细地分析了公务员群体的政治社会化、政治认同、公共精神以及政治行为。

总的来说,自1987年《中国政治手册》公民政治心理调研组的中国公民政治心理调查以来,还没有较为全面的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实证研究;虽然后来的个别研究试图进行与该调查数据的对比,但由于技术方法和测量指标不统一,这种对比并不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嬗变。

第二节 本研究的分析维度及研究假设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二十年是对于“中国模式”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的“大转型”的二十年。其间,中国不仅经历了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形成了“市场社会”,而且出现了“蓬勃的反向运动”,并正在催生一个“社会市场”。^②这两个方面对于中国而言都具有历史转折点的意义。本研究关注的正是这二十年中国政治文化的“变”与“常”,尤其是与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密切相关的那些政治文化观念,如对共同体、制度、当局和社区的认同感^③,对安全、秩序、公平、腐败等的感受,权威人格或物质主义价值观的强度,对政治问题的一般心理卷入程度,以及人们对自由和民主的看法等。

政治文化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即认知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认知取向,指的是“关于政治系统、它的角色和角色的承担者、它的输入和输出的知识和信念”;情感取向,即“关于政治系统、它的角色、人员和行为的感情”;评价取向,即“关于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见解,特别是那些涉及价值的标准和准则”^④。因此,本研究主要由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以及与政治价值观密切相关的社会观等四部分组成。而且,根据政治文化理论及已有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研究的结论,我们从变迁、分化、整合三个维度对认知、情感和价值进行分析。

① 参见李培林等《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267页。

② 参见王绍光《大转型:1980年代以来中国的双向运动》,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③ 戴维·伊斯顿认为,民众对系统的合法性支持主要包括政治共同体(political community)、典则(regime)和当局(the authorities)三个结构层次。(参见[美]戴维·伊斯顿《政治生活的系统分析》,王浦劬译,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199~227页)

④ [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

一、变迁的维度

文化本身具有稳定性,但重大的社会经济变革必然导致文化的嬗变。而且,按照现代化理论,当社会在经济上发展时,其文化通常会朝着可预测方向转变;转变的方向在现代化初期主要是文化的世俗化,即从对待权力的传统态度向世俗理性态度的转变;在后现代化阶段则是从生存价值观向自我表现价值观转变,或者说是从物质主义向后物质主义转变。^① 物质主义更注重传统的“实利性”目标,如经济财富、社会保障、法律秩序、宗教操守、国家安全稳定等;而后物质主义将注意力转向了自我表达、个人自由、社会平等、自我实现等目标。这些转变通常意味着公民文化的形成、稳固和发展。^② 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的二十年,中国经历了所谓的“大转型”,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全球化结伴而行,经济快速发展,创造了“中国奇迹”。所以,我们可以初步判断,虽然只有短短的二十年,但政治文化也许已经发生了静悄悄的变革;但是,由于文化积淀的差异,中国的这种变革可能难以与西方现代化理论完全契合。

二、分化的维度

不同的群体在同一政治系统内的政治取向不可能是完全一致的,任何政治体系内部都存在多种政治亚文化。虽然划分亚文化群体的主要边界是职业(社会阶层)和收入水平,但年龄、户口、阶层认同、受教育程度等的差异也可能造成政治文化的分化。

有关年龄阶层的理论认为:每个年龄段的群体都有他独特的政治经验和社会化经验,形成该群体一个永不磨灭的特色;每个人都会经历同样的生命周期,人生的各个阶段会有不同的政治态度,年轻人总是带有比较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变得比较切合实际;不同年龄的人甚至会在与其他年龄的人的冲突中来肯定自己。^③ 改革开放以后出生的青年

① 参见[美]英格尔哈特《文化与民主》,载[美]亨廷顿、哈里森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26~149页。

② 阿尔蒙德等把政治文化的类型分为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三种类型。村民型文化的突出特征是成员几乎意识不到中央政权的存在;臣民文化的突出特征是成员能够意识到中央权威的存在,但缺乏积极参与的取向;参与型文化的特点是成员在政治系统中扮演着“积极分子”的角色。任何文化都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混合,公民文化是参与型文化占主体的文化。(参见[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16~19页)

③ 参见[美]裴鲁恂《中国政治的变与常》,胡祖庆译,(台湾)五南出版社1988年版,第129~131页。

人是在与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的社会环境中长大的,我们可以初步判断年龄差异可能导致政治文化的分化。

主观阶层认同是指自我认同自己的阶级归属或近似于阶级归属的社会地位归属。李培林教授在对城市居民的社会冲突意识进行的调查研究中发现,决定人们的社会冲突意识和行为取向的不是人们的客观阶层归属,而是主观阶层认同,人们自己的认同阶层,更易于形成相对一致的对社会阶级阶层之间冲突严重程度的认识。^① 社会冲突意识及行为是人们社会政治观念的集中体现,我们由此推断,主观阶层认同不仅仅决定着社会冲突意识及行为,也可能是政治亚文化的一个重要划分边界。

户籍制度作为中国的一项基本制度安排,把户口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凭据,对城乡社会都产生了较大影响,甚至形成了“两个相互隔离的舞台”^②。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市场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和社会流动机制虽然发生了局部变迁,越来越多的人可以在体制外获得资源和流动机会,但是户口作为获取体制内资源的凭据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不仅户籍制度及相关福利政策构成了城乡收入差距的重要来源,而且它在很大程度上还决定着社会分层和个人的向上流动。^③ 也就是说,城乡居民作为城乡关系形态的两大利益相关群体,已经在制度变革过程中形成为两个不同的利益集团,城乡居民的政治文化观念可能存在一定的分歧。^④ 因此,我们有理由从户籍身份的角度考察城乡居民的政治文化观念。

阿尔蒙德认为,教育水平是同政治态度联系最紧密的变量,受教育程度高的人和受教育程度低的人,在政治态度上有实质性不同;受教育群体之间的差别在各国之间存在着一致性;受过较多教育的人比较容易参与政治,而受教育较少的阶层通常构成臣民型和村民型的亚文化,但受教育水平不决定参与活动的内容。^⑤ 英格尔斯也认为:“在规模巨大而复杂的社会里,在借以预见个人态度、价值观和行为的人的各种属性中,没有一项比人所接受的教育量更一贯、更有力。”^⑥我们由此推断,在当代中国,受教育水平不同的

① 参见李培林《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第263页。

②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00页。

③ 参见陆益龙《户口还起作用吗?》,载《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蔡昉《城乡收入差距的政治经济学》,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

④ 参见楚成亚《户籍身份与城乡关系观念》,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8年第4期。

⑤ 参见[美]阿尔蒙德、维巴《公民文化:五个国家的政治态度和民主制》,徐湘林等译,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第337~345页。

⑥ 转引自李普塞特《对民主政治的社会条件的比较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编《民主的再思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4页。

群体之间在政治文化上也可能存在广泛的差异性。

三、整合的维度

在现代社会中，政治文化的分化及其多元性是普遍的。但是，一个社会必须存在一些基本的共识，即存在一套核心价值体系，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精神支柱。一旦社会的核心价值体系解体，就意味着政治制度的根基出现了裂痕，极有可能导致全面危机。正因如此，对人们精神信念的“濡化能力”就成为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① 这种“濡化”需要以一个社会中大部分成员的共同价值取向为现实基础，并通过对政治社会化过程的治理使其得到延续和强化。人们通常认为，处于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中的转型社会总是面临政治动荡不安的困境；被引为佐证的不仅有一般发展中国家，也有苏东地区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就中国而言，真正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情。然而，中国无论是在改革前的加速工业化时期还是改革以来的全面现代化阶段，都大体保持了政治稳定。这一“政治奇迹”有制度机制方面的原因^②，也有文化层面的原因。我们的初步判断是，虽然人们对“认同危机”、“合法性危机”等有各种猜测，但核心价值体系的社会精神基础仍然存在。

第三节 资料及技术说明

本研究的实证资料的来源主要有两个：

一是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数据，该调查是在世界上有代表性的30多个国家中进行的，其中有关中国的调查是在1990年进行的，所以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中的中国数据反映的是1990年中国公民的价值观情况。该调查所涉及的范围包括生态、经济、教育、情感、家庭、性别、政府与政治、健康、道德、宗教、社会与民族以及工作等许多方面。这些数据可以从英格尔哈特等编写的《人类价值观与信仰：跨文化数据手册》(Human Values and Beliefs: A Cross-Cultural Sourcebook)中获得。

二是2009年1~2月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组织进行的“当代中国社会各阶层政治文化观念调查”。调查的主要区域是山东、河南、河北三

^① 参见王绍光《国家能力的重要一环：濡化能力》，载潘维、廉思主编《中国社会价值观变迁3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0~101页。

^② 参见楚成亚《二元社会与政治稳定》，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3年第4期；《城乡二元结构政治稳定机制的结构性缺陷》，载《资料通讯》2004年第2期。

省,采取调查员就近原则分配调查员去随机抽取的城镇或乡村开展调查,调查员在当地随机抽取当地户籍人员为调查对象,发放问卷。出于与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比较分析的需要,我们将被调查者的年龄限制在18岁以上。本次调查发放问卷3500份,回收有效问卷2741份,有效回收率为78%。在有效问卷中,一些变量的样本又因缺省值而被剔除。

本次调查涉及82个变量,其中性别、年龄、户口、政治面貌、受教育程度、职业、收入、主观阶层为交叉分析中的通用变量。为了与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我们对除性别、户口、政治面貌、主观阶层之外的多个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具体说明如下:

一、未经重新编码的变量

性别变量的数据为v1(您的性别),原始编码:

1=男(1507人,56.3%),2=女(1173人,43.7%)。

户口变量的数据为v3(您的户口),原始编码:

1=农业户口(1120人,41.8%),2=非农业户口(1535人,57.6%),3=其他(18人,0.7%)。

政治面貌变量的数据为v4(您的政治面貌),原始编码:

1=中共党员(625人,23.7%),2=共青团员(927人,34.3%),3=民主党派(29人,1.1%),4=无党派(群众)(1092人,40.9%)。

主观阶层变量的数据为v9(您认为自己属于哪一个社会阶层)^①,原始编码:

1=高层(31人,1.1%),2=中高层(201人,7.5%),3=中层(1004人,37.5%),4=中低层(757人,28.2%),5=底层(373人,13.8%),99=不知道(318人,11.9%)。

二、进行重新编码的变量

年龄变量v2(您的年龄)在原始调查中分为13档,在与1990~1993年世界价值观调查的对比分析中,我们将年龄变量分为三个层次:

1~4=29岁及以下(1330人,48.7%),5~8=30~49岁(1088人,40.6%),9~13=50岁及以上(274人,10.4%)。

文化程度变量v5(您的文化程度)在原始调查中分为6档,在交叉分析

^① 对主观阶层的分类,我们主要参考的是中国当代社会学家李培林在《社会冲突与阶级意识》一书中的阶层分类体系。为了便于理解和分析,与书中将主观阶层分为七层不同,我们去掉了最高层与最底层两个层次,将主观阶层分为五层。

的过程中,我们将其转化为三个层次,形成新变量:

1~2=低(622人,23.2%),3~4=中(1006人,37.2%),5~6=高(1060人,39.2%)。

为了更全面地概括所有职业分布,我们在原始调查中将职业变量 v6(您的主要职业)划分为 17 个职业项目。在进行实际分析时,为了简化交叉分析过程,更好地归纳出当代中国公民的客观阶层归属,我们将性质相同或相近的职业划分为一类,从而在 17 个子项目的基础上将职业划分为 9 个阶层,产生新变量:

1、2=中小企业主(129人,4.8%),3=企事业单位技术层(282人,10.5%),4、5=企事业单位非技术层(316人,11.7%),6、7、8、9、10=城市普通劳动者层(405人,14.9%),11=农业生产者(235人,8.8%),12、13=公务员(210人,7.9%),14=大学生(559人,20.5%),15=城市无业、失业及半失业人员(47人,1.7%),16、17=其他(507人,18.8%)。

在原始调查中,收入变量 v7(您家 2008 年的人均纯收入)分为 9 档,在实际分析时我们将收入划分为三个层次:

1~4=低(1536人,56.9%),5~7=中(991人,36.6%),8~9=高(134人,5.0%)。

第一章 当代中国的政治社会化媒介

政治社会化即个人获得政治信仰和价值以及这些信仰和价值的代际传递过程。这一过程伴随着人生的历程而不断发展,并可以大体划分为早期政治社会化阶段、成年期政治社会化阶段、继续政治社会化阶段以及再政治社会化阶段。

第一节 大众传媒与学校的主体地位

在不同的政治社会化阶段,人们会接触到不同的政治社会化媒介。阿尔蒙德和鲍威尔在《比较政治学》中,列出了包括家庭、共同体、教会、学校、工作场所、大众传播工具、专业化的政治输入结构、专门的输出机构等在内的十几种媒介,并认为主要媒介之间的“一致性”是成功社会化的首要促进因素。^① 我们结合我国国情,着重考察了家庭、学校、广播电视、互联网、工作经历等几类政治社会化媒介的功能和作用。

在考察上述媒介对被访者获得有关政治问题的认识的影响程度时,我们设计了“有很重要的影响”、“有重要影响”、“有影响”、“没有影响”和“说不清”五个选项,并把“有很重要的影响”和“有重要影响”视为对该媒介的作用的肯定性评价,把“有影响”和“没有影响”视为否定性评价。从不同政治社会化媒介影响程度的统计结果来看,对被访者获得有关政治问题的认识影响最大的媒介依次为电视报纸、学校、互联网、家庭和工作经历,“有很重要影响”的选择比例分别为 38.3%、32.2%、28.8%、27.9%和 23.6%。这一调查结果与政治社会化的一般规律是基本一致的(见表 1-1-1~1-1-5)。

^① 参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91~118 页。

表 1-1-1 家庭教育对获得有关政治问题认识的影响

	频 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重要的影响	805	29.8	29.8	29.8
有重要影响	638	23.6	23.6	53.5
有影响	874	32.4	32.4	85.8
没有影响	276	10.2	10.2	96.1
说不清	106	3.9	3.9	100.0
小 计	2699	98.5	100.0	
缺 失	42	1.5		
合 计	2741	100.0		

表 1-1-2 学校教育对获得有关政治问题认识的影响

	频 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重要的影响	993	36.2	36.8	36.8
有重要影响	869	31.7	32.2	68.9
有影响	616	22.5	22.8	91.7
没有影响	159	5.8	5.9	97.6
说不清	65	2.4	2.4	100.0
小 计	2702	98.6	100.0	
缺 失	39	1.4		
合 计	2741	100.0		

表 1-1-3 大众传媒对获得有关政治问题认识的影响

	频 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重要的影响	893	32.6	32.8	32.8
有重要影响	1041	38.0	38.3	71.1
有影响	679	24.8	25.0	96.1
没有影响	61	2.2	2.2	98.3
说不清	47	1.7	1.7	100.0
小 计	2721	99.3	100.0	
缺 失	20	0.7		
合 计	2741	100.0		

表 1-1-4 互联网对获得有关政治问题认识的影响

	频 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重要的影响	549	20.0	20.3	20.3
有重要影响	777	28.3	28.8	49.1
有影响	858	31.3	31.8	80.9
没有影响	349	12.7	12.9	93.8
说不清	167	6.1	6.2	100.0
小 计	2700	98.5	100.0	
缺 失	41	1.5		
合 计	2741	100.0		

表 1-1-5 工作经历对获得有关政治问题认识的影响

	频 次	百分比(%)	有效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有很重要的影响	637	23.2	23.6	23.6
有重要影响	754	27.5	27.9	51.4
有影响	756	27.6	28.0	79.4
没有影响	351	12.8	13.0	92.4
说不清	206	7.5	7.6	100.0
小 计	2704	98.7	100.0	
缺 失	37	1.3		
合 计	2741	100.0		

家庭是早期政治社会化的主体,是政治社会化的基本媒介。家长的言传身教以及家长本身所持有的政治态度和政治倾向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影响着早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的子女,并对其成年期的社会化起着奠基和导向的作用。在传统社会中,人们通过家庭所形成的政治倾向,虽然到成年时往往会被修正或深化,但很少会剧烈地改变。但是,家庭中的政治社会化毕竟是以间接方式为主的,而且“现代条件下儿童所处环境普遍带有更大的多样性,以及扩大式家庭结构的解体,家庭社会化的影响可能已经大大下降了”^①,取而代之的是大众传媒和学校。

在现代社会中,广播、电视、报纸等大众传媒是一种与国家共生的组织和机构,由于它具有能够利用相对先进的技术向为数众多的听众、观众和读

^①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4页。

者传递信息的特点,所以日益成为强大的政治行为者,在政治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阿尔蒙德等人认为,大众传媒最明显和最重要的影响,就是“使得政治事件引人注目”以及“促进了政治信息的普遍化程度”^①。实际上,大众传媒也可能在政治社会化的过程中扮演更主动的“解释者”和“中介者”的角色。^②西方学者对媒体政治的阐释存在多种理论模式,包括多元主义模式、支配型意识形态模式、市场模式和精英主义模式等。多元主义模式把大众传媒描绘成一个“中立的”的意识形态市场;支配型模式认为,大众传媒是力图使大众保持顺从和政治消极的“政治保守力量”;市场模式认为,报纸和电视反映而非引导公众的看法;精英模式则认为,媒体主要反映自由知识分子的观点。^③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事业发展很快,国家也一直在总体上保持着对媒体的控制,主流媒体始终肩负着传播“主旋律”的义务。所以,虽然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深入,大众传媒越来越具有多元主义模式和市场模式的取向,但总体上仍然是支配型意识形态模式。

互联网是一种特殊的大众传媒。与具有主导性的传统大众传媒不同,互联网是一个具有高度开放性、高度包容性的场所。这一特性削减了其自身的“一致性”,使其虽然有海量的政治信息和庞大的受众群,却难以在塑造公民的政治情感、政治认知和政治价值方面发挥比传统大众传媒更大的影响力。

在学校中进行的政治社会化属于为将来真正地进入社会作准备的政治社会化阶段。学校可以加强或增添人们对政治体系的好感,也能提供共同的信条,使人们对共同体和政权作出富有感情的响应。学校还能使学生们接触到某些权威性的决策模式和服从模式,并影响到他们今后作为政治顺从者和参与者时的行为。^④当代中国的学校在发挥这些政治社会化功能方面有较为强大的制度保障:学校的课程体系及教学大纲是由国家制定或被国家认可的,各层次的学校几乎都有传授政治价值观念的专门课程,学校里有少先队、共青团、党支部等政治组织的存在,升国旗、唱国歌等仪式也对政治认同起着强化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成年人重要的个人环境之一是工作场所,人们可以通过工作经历,强化或削弱前期政治社会化过程中形成的某些政治态度、政治观念

① [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11页。

② 参见邵培仁《政治传播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23页。

③ 参见[英]海伍德《政治学》,张立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46~250页。

④ 参见[美]阿尔蒙德、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页。